

景定《建康志》所见《沿江大阊所部图》 相关问题考*

章 旺

提 要：收录于景定《建康志》的《沿江大阊所部图》是宋元方志中稀见的有关军事的舆地图，反映了南宋后期沿江制置司辖区范围，记载了27处兵船屯泊驻防信息。笔者对此图的地理要素、地域范围、军事信息等内容进行介绍和分析，并讨论沿江制置司的相关问题。沿江制置司设立的时间并非当前普遍认为的南宋初年，当以开禧二年叶适任沿江制置使为准。沿江制置司的辖区范围随着战争形势在不同时期多有变化。此图反映的沿江制置司管辖和州、无为军、安庆府淮西路三郡，是在淳祐二年确立。

关键词：景定《建康志》 《沿江大阊所部图》 沿江制置司 南宋

我国现存的古代舆地图有很大一部分出自地方志，宋代名志景定《建康志》就收录19幅。胡邦波对这些舆地图的数学要素、详备性和绘制年代、制图方法以及表示方法等方面已经做了研究^①，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它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中的《沿江大阊所部图》，不仅是现存较早的长江图之一，还是现有宋元方志中稀见的涉及军事信息的地图。对于此图，席会东认为其名意为“沿江大将统辖部署图”，是反映长江沿岸大将统辖部署军力的分布图。^②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并且胡邦波虽对此图的绘制方法、基本内容有过介绍，但这些方面仍有深入讨论的空间，同时此图延伸出的问题，如沿江制置司的设立及其辖区变迁，同样值得关注。有鉴于此，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一 《沿江大阊所部图》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此图之名所指。景定《建康志》目录又载其名为“建康开阊所部图”^③，两种称呼中均有“阊”字，此为何义？“阊”本义为门槛，南宋时人多用指代制置使司，文献中常被简称制司、制阊、阊司，是宋廷为应对金人、蒙古入侵设立的军事领导机构，如两淮地区有淮东、淮西制置司，川陕地区有四川制置司，长江防线有沿江制置司、沿江制置副司，两浙沿海有沿海制置司。南宋后期沿江制置司设置于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即“建康开阊”之意，而“沿江大阊”即沿江制置司，故图名意为沿江制置司统辖范围之图。

第二，此图绘制时间。图中标注“镇巢军”“宜城”两个行政单位治所，镇巢军的设置、安

* 本文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夏对峙格局下的陕西军政研究”（项目编号：20CZS028）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胡邦波：《景定〈建康志〉和至正〈金陵新志〉中的地图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胡邦波：《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中地图的绘制年代与方法》，《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参见席会东：《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第324—326页。

③ 此据景定《建康志》的清嘉庆六年（1801）金陵孙忠愍祠刻本原目。

庆府宜城的建筑均在景定元年(1260)^①,而景定《建康志》始修于景定二年三月,并成书于是年七月,故《沿江大阃所部图》绘制时间在景定二年前后,反映了当时沿江制置司辖区范围。

第三,景定《建康志》为何要将此图编入。首先,由于需要军民合一,历任沿江制置使都任建康府守臣,使得沿江制置司和建康地方的联系十分密切。其次,沿江制置司是南宋后期设立在建康府众多官司之中最为重要的机构。当时为应对蒙古的长期入侵,沿江制置司的军事事务重要且繁忙,景定《建康志》就提到:“近年专以(沿江)制置司为重,而(江东)安抚司之事则甚简矣。”^②在严重的军事危机下,制置司军务显然要放在首位,民政相关的安抚司事务就处于次席。景定《建康志》将此图收录,是反映建康府的地方政治和军事情况,亦体现了沿江制置司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二 沿江制置司设置考

《沿江大阃所部图》反映南宋后期沿江制置司辖区范围,但关于沿江制置司的设立,不同史料说法不一,互有出入,以致现有研究将南宋不同时期的江防机构与沿江制置司混淆,认为沿江制置司的设置是在南宋初建炎年间。^③兹引三段较为完整的史料,以讨论其设立情况:

沿江:建炎三年六月,刘宁止提领水军为副使;闰八月,胡舜陟为沿江都制置使、知建康,王羲叔为副。绍兴四年,马扩为江西沿江制副,屯武昌。隆兴二年十一月,沈介知鄂州兼沿江制置使。乾道三年八月,命知建康史正志兼。总建康至鄂渚舟师。开禧二年七月,知建康叶适兼。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日,诏置司建康。十四年,诏制副置司鄂州。李埴为之。^④

(建炎三年)六月,以太中大夫、工部侍郎汤东野知(建康)府事。闰八月,东野改除提举应副六官事务。同月,以朝请郎、徽猷阁待制胡舜陟知(建康)府事,兼沿江制置使。沿江制置使始此。^⑤

粤自督视宣威,次第省并。而“沿江制置”之名,始建于开禧二年之七月,待制叶公适首膺是选。越明年春,易“沿江”为“江淮”。迨嘉定初元,宣使赵公淳实为制使,而又以资政丘公密为大使。其年夏,并召还。未阅月,复以总饷李公洪区处制司事务。又两月,观文何公澹以知(建康)府行大使事。是后更代不绝。嘉定十二年,朝有分制之议,阁学李公大东荐来帅守,始复为沿江制置使,“沿江”之名,于是乎定。^⑥

①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册,第694页。

②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5《官守志二·制置司》,“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2册,第1177页。

③ 相关研究如熊燕军:《南宋抗金之江防机构考》,《江汉学术》2013年第1期;黄纯艳:《南宋江防体系的构成及职能》,《河北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申亚平:《南宋沿江制置司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张龙凤:《南宋沿江水军制置使司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④ 王应麟:《玉海》卷132《官制·绍兴制置使、大使》,元至元六年(1340)庆元路儒学刻本,第23页。“马扩”,原作“马广”,据《宋史》卷27《高宗纪四》(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514页)改。

⑤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596页。“太中大夫”,原作“大中大夫”,据宋官制改。

⑥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5《官守志二·制置司》,“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2册,第1181页。按,标点有调整。

（一）南宋初年“沿江措置”和“沿江制置”辨析

前引三段材料记述沿江制置使设立的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材料一出自王应麟《玉海》，此列刘宁止任职情况是最早的记载。然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1129）六月癸酉，“龙图阁待制、提领水军、沿江措置使陈彦文试尚书兵部侍郎，仍充措置使，尚书右司员外郎刘宁止直龙图阁、同提领水军，充措置副使”^①。刘宁止当为沿江措置副使，而非沿江制置副使。况且，早在建炎三年二月，陈彦文就以知江州兼沿江措置使，通判襄阳程千秋为副使。^②

材料二景定《建康志·建康表》则以胡舜陟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作为设沿江制置使之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载此事，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寅，“徽猷阁待制、知庐州胡舜陟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集英殿修撰王羲叔副之。先是，舜陟言欲专治军旅，前迎大敌，以谋与战，仰护行在。……会兵部侍郎、沿江措置使陈彦文引疾罢为龙图阁直学士、在外宫观，乃卒用之”^③。此处，知胡舜陟是接替原沿江措置使陈彦文的职务，但除授的官职却是“沿江都制置使”，《宋史·高宗纪》^④和《宋史·胡舜陟传》^⑤记载相同。检核其他史料，胡舜陟却为沿江措置使，非“沿江都制置使”。首先，《北海集》有外制《朝散郎充徽猷阁待制提领水军沿江措置制使胡舜陟为前知庐州日因郡盗孙琦攻城守御有劳可特转一官授朝请郎制》^⑥，《大隐集》亦有《胡舜陟水军措置使制》《王羲叔水军措置副使制》两制^⑦；其次，胡舜陟的同乡晚辈罗愿为其作传，记“舜陟提领水军、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军使”^⑧；再次，淳熙十二年（1185）杨万里为伯祖父杨邦乂撰写的行状提到，建炎三年九月杨邦乂除通判建康府、提领沿江措置使司公事，胡舜陟出守建康不久就与驻守建康的江淮宣抚使杜充产生矛盾，改两浙宣抚司参谋官^⑨，遂由通判建康府杨邦乂任提领沿江措置使司公事。^⑩另据胡铨撰《高世吏行状》载，高世吏建炎三年被辟为沿江措置使司干办公事、兼权提领。^⑪由此可见，建炎三年在建康府设立的是沿江措置司，胡舜陟除授的官职实为沿江措置使。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沿江措置使、副使先后有王羲叔、朱芾、李允文任。^⑫至绍兴元年（1131）十月，知鄂州、沿江措置副使李允文“坐拥兵跋扈，擅权专杀”，诏赐死。^⑬此后，文献中再无沿江措置使除授的记载，其建置当废，自建炎三年初始设，存在时间仅两年有余，亦

① 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4，建炎三年六月癸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16页。

② 参见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己未，第411页。

③ 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寅，第545—546页。

④ 参见《宋史》卷25《高宗纪二》，第468页。

⑤ 参见《宋史》卷137《胡舜陟传》，第11670页。

⑥ 参见蔡崇礼：《北海集》卷4，“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第38册，第111页。

⑦ 参见李正民：《大隐集》卷3，“宋集珍本丛刊”，第36册，第104页。

⑧ 罗愿：《罗鄂州小集》卷6《胡待制舜陟传》，“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741页。

⑨ 参见罗愿：《罗鄂州小集》卷6《胡待制舜陟传》，“宋集珍本丛刊”，第61册，第741页。

⑩ 参见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118《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邦乂）行状》，中华书局，2007年，第4522页。

⑪ 参见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卷31《衡州太守高大夫（世吏）行状》，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第6页。

⑫ 参见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二月乙亥，第628页；卷32，建炎四年夏四月癸未，第650页；卷34，建炎四年六月甲午，第689页。

⑬ 参见李心传撰，辛更儒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8，绍兴元年冬十月丁卯，第881页。

反映沿江措置司实为南宋应对江防危机的初步尝试,仅是临时性机构。建炎至绍兴初,金军入侵频繁,南宋不断迁移,其时也有制置司设立,在不稳定的形势下,官方记录可能混淆“制置”与“措置”,导致“沿江措置司”名称记载出现错误。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景定《建康志》、《玉海》、《宋史》成书均参考宋代官修文献,这些史料出现讹误也就不奇怪了。

此外,材料一还提到沈介、史正志等人均为“沿江制置使”。但查阅相关史料,发现沈介实为鄂、岳、江、黄州、汉阳军沿江制置使^①,史正志则为沿江水军制置使^②。就名称进行辨析,严格意义上讲,两人的任职都不能算是“沿江制置使”。无论是沿江措置司,还是沿江水军制置司,它们均是宋廷设立的临时性机构,存在的时间仅二三年,机构设置未有连续,名称、治所、辖区、职能亦不同。当前研究中,仅以名称相似,未做细致的考辨,误将它们等同于南宋后期设立的沿江制置司。

(二) 开禧二年(1206)沿江制置司的设立

宁宗开禧二年五月,权臣韩侂胄有志于功业,发起北伐。同年七月,宋廷诏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叶适兼沿江制置使。^③关于设立沿江制置司的原因,叶适自言:

丙寅岁,骤起师北伐,余争论于朝,请升、润、江、池别募兵急备守,补楼船器甲之坏以虞寇至,未之许也。无几,田俊迈为虏得,郭倬、李爽、皇甫斌不任战而溃,中外惊悚,遂出余金陵,制置江上。^④

当时,韩侂胄未作充分准备,贸然发动北伐。但仅两月,除毕再遇一部外,前线诸军屡战屡败。在此形势下,南宋只能转攻为守,设立沿江制置司,以防金军趁机南下,侵透长江。前文述及临时性江防机构亦大都是在金军逼近长江,南宋军事形势急剧恶化的背景下设立。

因此,沿江制置司的设立时间当以材料三为准,即绍定元年(1228)沿江制置司幕僚吕好问撰《(沿江)制置司签厅记》所述,在开禧二年七月以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作为首任沿江制置使。后来,沿江制置司虽因内外形势,历经几次短暂的省置,但在南宋后期作为常设性军事机构长期存在,在名称、治所、职能、管辖范围上一直保持着连续性。

三 《沿江大阆所部图》的内容研究

《沿江大阆所部图》的内涵丰富,以下将从三个方面考察其中的地理和军事信息,了解绘制者在图中的主观表达和意图。

(一) 《沿江大阆所部图》基本情况和地理要素

《沿江大阆所部图》分上、下两图(见图1),方位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总体分为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长江江面三个部分,各部分占图比大致相等。长江以北区域的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到长江最短直线距离90多公里,而此图绘出的长江以南区域,都仅向南延伸至沿江行政单位治所周边,普遍在10—20公里之间,故三个部分的比例尺不同。此图绘出的长江江面是

① 参见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0之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94页。

② 参见《宋史》卷34《孝宗纪二》,第641页。

③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61页。

④ 叶适著,刘纯等点校:《叶适集》卷10《叶岭书房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175—176页。

池州到南京一段（见下文），呈西南往东北走向，该图则将这段长江的流向绘为由正西到正东，因而图中的长江以北、以南区域以长江为中轴，呈正北、正南方向。胡邦波已指出《沿江大阘所部图》采用不画方的平面地图绘制方法。^①这也是中国古代志书中所附舆地图的一般绘图方法，即视地表面为平面，把地表面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要素，按一定比例缩制到地图平面上。同时，又一般运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画法，将地形地物形象化，再辅以记注来表达制图者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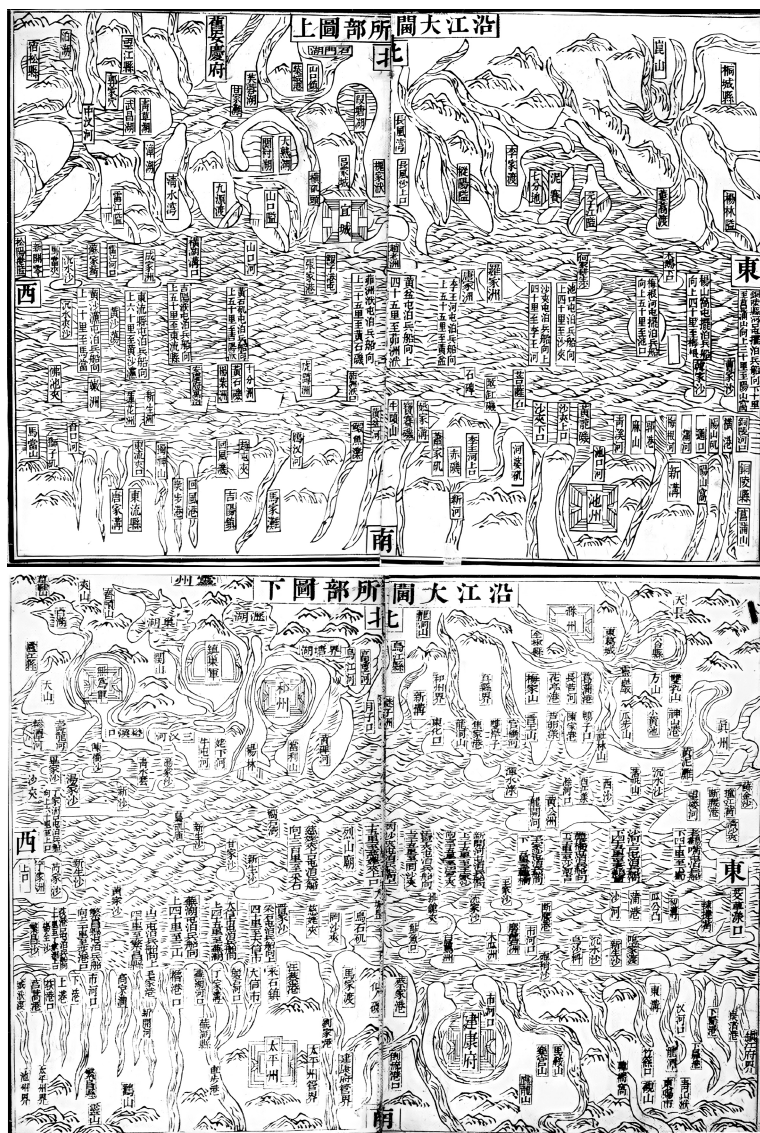


图1 《沿江大阘所部图》^②

① 参见胡邦波：《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中地图的绘制年代与方法》，《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引自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48、149。

地理要素是地图的基本构成部分,包含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此图的人文地理要素有州县治所、市镇、港口、渡口、关隘、行政区划边界以及兵船的屯泊驻防信息。州一级治所绘城墙、城门表示城池,各州城池有明显绘制繁简程度的区分,应是城池规模越大,其绘制越复杂。关隘统一绘制简略的墙垒表示。除以上两种,其余人文要素都仅标注文字。自然要素有山川、河流、湖泊、河口、岩石、沙洲。山川的山形描绘依山势险峻或平缓、或瘦长,饰以多重线条。湖泊描绘亦依其形态,河流用双线表示主流及支流,都加绘波纹。长江中的沙洲用椭圆、不规则闭合曲线来表现。以上对《沿江大闸所部图》的地理要素介绍是基于景定《建康志》的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此书还有另一种通行版本是《四库全书》本。四库本除将州级治所的城池统一简略绘制和误将建康府江面的苏金沙等几个沙洲绘成相连,两种版本的《沿江大闸所部图》无其他明显区别。^①由于辗转传抄的原因,两种版本的记注都存有阙字和讹误,二者互相参校,可以厘正。如嘉庆本在“王家沙向下十五里至韩桥”,阙“十”字;“三山屯泊兵船向上四十里至繁昌县”,“三山”误作“山三”。四库本如“虎蹲洲”,阙“虎”字;“宣城”误作“雷城”。

(二)《沿江大闸所部图》的地理范围

《沿江大闸所部图》绘出的地理范围广阔,需要考察其中的人文地理要素来确认。图中“宿松县”“松阳港隘”皆标注在长江以北区域最西侧的位置,基本处于同一南北线上。宿松县治在安庆府境西面与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交界附近,松阳港隘是沿江北岸的最西端,但史籍无载,不知具体位置;不过宿松县治的东面、东南面、南面是大雷池,由3个湖泊构成,皆水域辽阔,临近长江,而图中只绘出东面的泊湖及沟通诸湖的中汶河,不见其余两湖,表明其未绘出宿松县治南面、东南面的很大一部分辖境,故宿松县治的实际位置在松阳港隘的西北方向;长江以北区域最东端标注有“真州”,真州城在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市)和扬州交界附近,所以长江北岸涵盖的主要行政单位有淮西路的安庆府、无为军(治今安徽无为市)、和州(治今安徽和县)以及淮东路的真州。还需注意的是,尽管长江以北区域还标注有“庐州”“滁州”“全椒”“天长”等几个行政单位治所,但其周边的山川、河流都未有标注,可知它们非此图主要涵盖的行政单位。

长江南岸最西侧标注有“马当山”,此山在江州彭泽县(今江西彭泽县)境内^②,位于彭泽县和池州东流县(今安徽东至县)交界附近^③;最东侧标注有“镇江府界”,前有“炭渚港”和“下蜀港”两个港口,分属镇江府和建康府^④,炭渚铺是镇江丹徒县治至建康府界的界首^⑤,进而可推断炭渚港在建康府和镇江府交界附近。综上所述,涉及的行政单位包括江州、镇江府,但都仅是与他州交界附近的很小一部分地域,所以从江州至镇江府之间的池州、太平州、建康府,是长江以南区域涵盖的主要行政单位。明晰了此图涵盖的行政区域后(见图2),由此可见长江

①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88册,第55—56页。

② 参见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6《江南路·东路·江州》,中华书局,1984年,第243页。

③ 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江南西路”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册,第61页。

④ 参见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6《地理·港》,“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3册,第2371页;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9《山川志三·河港》,“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2册,第887页。

⑤ 参见史弥坚修,卢宪纂:嘉定《镇江志》卷12《公廨·邮传》,“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第2409页。

南北沿岸最东端大致隔江相对。临近长江北岸最西端松阳港隘的雷江口，今已不存，不过其旧址（今安徽望江县雷池乡）到马当山的直线距离约 22 公里，相距并不遥远，长江南北沿岸最西端也应大致是隔江相对。

绘出这些长江南北沿岸地区及其基本重合，与沿江制置司所辖江面范围有关系，景定《建康志》载：“（大江）隶沿江制置司所部者一千七十一里，西至马当，东至镇江，南北两岸皆隶焉。”^① 据此可知，属沿江制置司的管辖长江范围是由江州马当至镇江府界，即江东路沿江的池州、太平州、建康府三地江面，此亦《沿江大阃所部图》绘出的长江江面范围，不将宿松县南面、东南面的很大一部分辖境绘出，当因其相邻的江面不属于沿江制置司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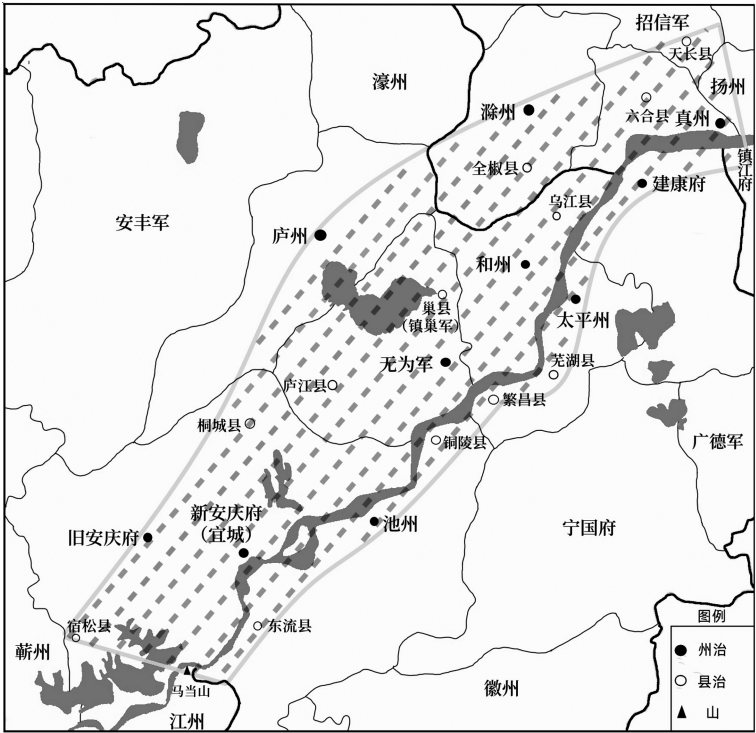


图 2 《沿江大阃所部图》绘出行政区域大致范围（虚线部分）^②

（三）《沿江大阃所部图》的军事信息与沿江防御

《沿江大阃所部图》作为一个反映军事机构辖区范围的地图，其中的军事信息无疑是重要的。图中共标注 27 处兵船屯泊信息，内容包括屯泊地和负责的防区范围，展现当时江防布署，如载“采石屯泊兵船向上四十里至大信市”“大信市屯泊兵船向上四十五里至芜湖”。其中，建康府屯老鹳嘴、沙河上口、韩桥、王家沙、新开河、江宁夹、罔沙夹、慈姥夹等 8 处，太平州屯

①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 18《山川志二·江湖》，“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 2 册，第 857 页。“一千七十一里”，原作“一千口百里”，据同书卷 38《武卫志一·江防》（第 1661 页）和四库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89 册，第 71 页）改。

② 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6 册南宋“两浙西路 两浙东路 江南东路”图（第 59—60 页）、“淮南东路 淮南西路”图（第 62 页）以及《沿江大阃所部图》改绘。

采石、大信市、芜湖县、三山、繁昌县、荻港口、丁家洲等7处，池州屯铜陵县、杨山窝、梅根河、池口、沙夹、李王河、黄盆、茆洲淤、黄石矶、吉阳淤、东流县、黄沙浣等12处。^①除部分是长江沙洲，大多数屯驻地都在长江南岸，以沿江制置司管辖1071里计算，平均每40里就屯泊一处，可见兵船分布严密。其中两处地点采石矶和丁家洲，南宋时曾爆发过激烈战斗。一是采石之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南侵，攻至江北，后从和州杨林渡江。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宋军于采石矶一带江面大败金军，使南宋转危为安。二是丁家洲之战，德祐元年（1275）初元军渡江攻占鄂州后，一直顺流沿长江而下，平章军国事贾似道开督府领兵拒敌。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一带大战，元军大败宋军，消灭了南宋大量军事力量，为元军夺取沿江州郡奠定重要基础。

除了《沿江大阍所部图》，景定《建康志》还载有一些关于沿江防御的兵力部署情况。景定四年（1263），沿江制置司根据朝廷“沿江建屯，招军防捍，务使声势连属”的指挥，创招宁江新军6200余人，将其分屯29处，其中“建康八屯：曰下蜀，曰马家步，曰沙河，曰韩桥，曰王沙，曰新开河，曰下三山，曰汪蔡港。太平七屯：曰濮家圩，曰褐山，曰采石矶，曰白泥浦，曰上三山，曰板子矶，曰周家庄。池州十四屯^②：曰菖蒲山，曰大通，曰梅根，曰冗港，曰戚家沟，曰李王河，曰宝赛矶，曰黄石矶，曰吉阳淤，曰祝家矶，曰乌石矶，曰香口，曰双山”^③。后来沿江制置大使马光祖认为，“宁江分屯二十有九，然少者仅数十人为一屯，非所以联队伍、壮气势也”，将29屯合并为沙河、韩桥、下三山、褐山、乌石港、上三山、板子矶、周家庄、菖蒲山、梅根、戚家沟、李王河、吉阳淤、乌石矶、香口等15寨，每寨500人左右。^④这种屯戍方式是建寨屋，将一批士兵永久屯戍于一地，专一守御此处。据景定《建康志》所载，除宁江新军分屯池州、太平州、建康府的江防要处和雄武军寄泊安庆府宜城，诸如建康都统司、马军司及众多新军的营寨均在建康城内或周边^⑤，所以《沿江大阍所部图》记载的兵船屯泊某处，更可能是调戍而来，又定期拆洗，轮换士卒。并且，池州、太平州皆是南宋时的屯兵要地，驻军人数众多，嘉熙三年（1239）时知镇江府吴潜言“当涂有水军五千人、雄江军五千人；池州有水军、防江军八千人，又有戎司军”^⑥，淳祐五年（1245）又有策胜先锋、后军一万人屯池州^⑦，军事部署不可能舍近求远，故两地屯泊的防御兵船应当出自本州驻军。或许正因没有专门守御长江南岸险要处的军队，才有景定四年宋廷令沿江制置司创招宁江新军，分屯沿江各处。《沿江大阍所部图》载录的兵船屯泊地，仅有少部分与宁江新军的屯驻地点相同，而这不意味未见宁江新军屯驻的地点不再有戍兵，沿江制置司自身的兵力部署和池州、太平州的防御安排当不冲突，因原有的一些屯驻地是下辖县、市镇，本州有兵力屯驻十分正常。又如宁江新军15寨中未见屯

① 杨山窝，图中有标注为“阳山窝”的地名；黄沙浣，图中有标注为“黄沙荡”的地名。

② 此言池州有14屯，但实际只有13屯。

③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一·江防》，“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661—1662页。“双山”，四库本作“双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9册，第473页）。

④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一·江防》，“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662、1668—1669页。

⑤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23《城阙志四·营寨》，“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2册，第1102—1108页。

⑥ 吴潜撰，汤华泉编校：《吴潜全集》卷12《奏乞增兵万人分屯瓜洲平江诸处防拓内外嘉熙三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5页。

⑦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9《武卫志二·尺籍》，“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679页。

驻要地采石，因孝宗淳熙年间创立的采石水军专门屯戍于此，进行守御。^①

《沿江大阊所部图》载录的兵船屯泊驻防信息以及宁江新军的分屯地，皆未见有兵力屯驻长江北岸，但图中在长江北岸绘有一定数量的关隘，如安庆府境内有枞阳隘、元子江隘、杨林隘等，表明长江北岸通过关隘防控渡口。而自绍兴和议后，至孝宗时，宋廷在江陵府、鄂州、江州、池州、建康府、镇江府、平江府等沿江重镇陆续建立多支驻屯大军，定期出戍两淮和襄汉前线。这种军队大规模屯驻江南的军事体制，当时既是为防金国借口屯兵边境进行南侵^②，亦体现南宋对长江防线的重视。然而，不少宋臣批评江南屯重兵、忽视江北的军队屯戍体制，如刘子翥就说：“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③又如叶适任沿江制置使后，上疏强调三国孙吴、六朝以来皆重兵守江北，批评南唐至今不重视江北的政策。^④

南宋后期，延续旧有体制的同时，宋廷在江北的军事建设逐步增强，嘉定年间开始大规模建设两淮城池^⑤，迁入士卒。无为军巢县自宋蒙战争爆发后，更“增城筑坝，屯兵几至万人”^⑥。但在蒙古连年进攻下，宋廷顾此失彼，如嘉熙元年（1237）蕲州、安庆府被攻破后，皆寓治长江的沙洲中^⑦，直至景定元年（1260）、三年先后筑安庆、蕲州新城。^⑧当时，宋廷长时间无力在江北恢复两州治所，加之重兵防守江南的固有军事体制和传统，以及江北城池的兵力防御需要，当无过多的兵力布署在江北沿岸，仅通过关隘对部分渡口进行防控。如距和州城二十里有杨林堡，即采石之战时金军渡江处，淳祐二年（1242）沿江制置使杜杲视察后，认为此堡不必守御，“罢其戍，以守堡之资，增备和之费”^⑨。对和州杨林堡的处理，体现了当时宋廷的江防重点不在江北沿岸。自采石之战直至景定二年百余年间，金人、蒙古虽屡攻入淮南地区，抵达江北沿岸，但除蒙军于开庆元年（1259）在两淮最西侧的黄州界渡江外，都未从其他州郡侵入江南，长久以来大部分地区的江防无虞，一定程度上使得宋廷在江北沿岸防御未投入过多的防御力量。

宁江新军的驻防分布，加上勤于训练，宋人认为在御敌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景定《建康志》即言：“虏闯濡舒，诸屯旗帜鲜明，炮坐森列，步骑出入，金鼓喧轰；其习熟波涛者，又操舟往来，上连下接，虏隔江觐其有备，乃遁去。”^⑩此为溢美之词，且未有史料证实当时蒙军退兵与宁江新军江南屯驻有关。宋蒙战争时期，未爆发过蒙军从沿江制置司辖区正面渡江的战役，因而无论是《沿江大阊所部图》载录的27处兵船屯泊防御，还是宁江新军15寨分屯驻防，其实际效果均未得到检验。

① 参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7页。

② 参见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兵6之6，第8719页。

③ 刘子翥：《屏山集》卷7《论时事札子八首代宝学泉州作·江北》，“宋集珍本丛刊”，第42册，第243页。

④ 参见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卷2《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均状》，第13页。

⑤ 参见李超：《史弥远对金政策及其与理学关系之检讨——以嘉定筑城运动为中心的考察》，《宁波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

⑥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一·江防》，“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657页。

⑦ 参见吴潜撰，汤华泉编校：《吴潜全集》卷12《奏条画上流守备数事》，第358页。

⑧ 参见《宋史》卷45《理宗纪五》，第876、882页。

⑨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79页。

⑩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一·江防》，“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663页。

四 沿江制置司的辖区范围

景定《建康志》记载沿江制置司管辖的江面“西至马当，东至镇江”，且“南北两岸皆隶焉”，这如何理解呢？尽管未明确指出具体地域，但“南岸”指建康府、池州、太平州，即江东路沿江州郡；“北岸”指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即淮西路沿江州郡（详见下文）。当然，景定《建康志》所记是其成书时沿江制置司的辖区范围。南宋后期，宋廷先后与金人、蒙古交战，战事频繁，军事领导随战争形势多有调整，沿江制置司的辖区随之变化。就现存史料看，沿江制置司先后分管浙西州郡和淮西州郡。

宝庆三年（1227）正月，沿江制置司为本司荐举官属之事申报。^① 据此可知，当时沿江制置司管辖江东建康府、太平州、池州和浙西镇江府、平江府、嘉兴府、常州、江阴军共八地，皆是长江南岸沿江州郡，为江岸防守区域。江面范围亦可推断为江东、浙西两路江面，即江州马当以下，直至长江入海口。

宋蒙战争爆发后，嘉熙三年浙西制置使、知镇江府吴潜奏江防形势。^② 吴潜叙述蒙军可从江北的通、扬、真、泰州，渡江至江南的镇江、常州、平江、嘉兴、江阴等江防要地，须多加防备。据其中“旧虽隶沿江制司”之语，知嘉熙三年时浙西路沿江五州郡及其江面已不归沿江制置司管辖。其原辖江东、浙西两路江岸和江面，防御范围极广，在交通、通信方式落后的时代，难以掌控整个长江下游防线，故吴潜称虽设“沿江制司”，主掌江防，但“亦往往窘于事力之褊短”，“不及措置”浙西的防御。宋廷应有出于分担沿江制置司江防压力和完善江防体系的考虑，于嘉熙三年五月“建阃浙右”，以吴潜为浙西制置使、知镇江府^③，置司镇江，专门负责浙西防务。

淮西的军事领导经历了多次调整，才确立沿江制置司管辖部分淮西州郡。端平三年（1236）冬，蒙军始大举进攻淮西。十一月，蒙军破光州固始、濠州定远，淮西告急。宋廷意“为淮西声援”，诏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援光州，淮东制置使赵葵援庐州，沿江制置使陈埴遏和州。^④ 此后，蒙军又破真州六合，更至与建康隔江相望的真州宣化镇。沿江制帅陈埴调亲兵自建康渡江前往阻击，“诸士殊死战三昼夜，皆死之”^⑤。此役陈埴遣兵击退蒙军，且其素有军功，声名在外，故大臣吴泳认为可以增重其事权，兼任淮西制置使，分掌淮西防务。^⑥ 至嘉熙元年（1237）三月，宋廷以沿江制置使陈埴兼淮西制置使。^⑦

嘉熙元年底，蒙军再分兵攻淮西，犯安丰军、围光州。当时，陈埴调建康都统制王忠援蕲、黄州，池州都统制吕文德援安丰，后黄州被围，又调江州都统制万文胜赴援，但均不能退敌。^⑧ 最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调荆鄂都统制孟珙援黄州，淮东制置使赵葵调招信军余玠援安丰，才

① 佚名撰，刘笃才点校：《吏部条法·荐举门》，“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册，第268页。

② 吴潜撰，汤华泉编校：《吴潜全集》卷12《奏乞增兵万人分屯瓜洲平江诸处防拓内外嘉熙三年》，第351页。

③ 参见《宋史》卷42《理宗纪二》，第818页。

④ 参见《宋史》卷42《理宗纪二》，第812页。

⑤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46《忠肃陈观文（埴）神道碑》，中华书局，2011年，第5771页。按，标点有调整。

⑥ 参见吴泳：《鹤林集》卷20《边防札子》，“宋集珍本丛刊”，第74册，第471页。

⑦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76—677页。

⑧ 参见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46《忠肃陈观文（埴）神道碑》，第5771页。

解两地之围。^①此役，知蕲州张可大、知安庆府李士达弃城逃，知光州董尧臣以城降。^②沿江制置陈辔论劾被罢，力挫蒙军进攻安丰的守臣杜杲除淮西制置副使、知庐州^③，负责淮西防务。

两次蒙军侵入淮西之役，皆深入腹地，侵掠数州，更抵江北沿岸，单凭淮西之力难以守御，需其他制司援助才可，宋廷内部也往往强调各制司之间要“脉络贯通”。嘉熙三年六月，秋防将至，宋廷即诏“和、濡急则江闽援之”^④。当时，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赵希潞亦言：“欲救淮西，非以江闽兼领不可。”^⑤可见，宋廷内部形成了置司建康府的沿江制置司支援淮西防务的共识。

至淳祐元年（1241）初，淮西制置使杜杲去职；三月，沿江制置使别之杰兼淮西制置使，兼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⑥淳祐二年三月，宋廷诏“沿江、两淮唇齿相依，其令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听沿江制司节制”^⑦，将淮西三郡防务隶于沿江制置司。四月，杜杲除沿江制置使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⑧而和州、无为军、安庆府在行政区划上属淮西路，自杜杲起，虽不再有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但历任制帅皆有“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的兼职，并加“节制”二字，故沿江制置使带此衔，以示分管此淮西三郡的防务和屯田事务。淮西三郡处于的长江北岸，与沿江制置司辖有建康府、太平州、池州的长江南岸隔江相对，地理条件上有利于统筹长江南北岸的防御。理宗给沿江制帅马光祖的御札即言：“古舒（安庆）与秋浦（池州）相望，一衣带水，昔人所谓风寒处也。……此国家以淮西三郡隶升阊（沿江制置司）之初意也。”^⑨基于江东和淮西地理区位进行军事部署，早在孝宗时确立屯驻大军体制就已出现，如建康府、池州屯驻的大军就近出戍江北的淮西州郡，“建康马司兵戍滁、濠、定远，都统司兵戍庐、和、安丰，以至池司兵戍舒、蕲、巢县”，此“地势皆顺”^⑩。从现实情况看，淮西三郡的防务确实归于沿江制置司，如景定元年（1260）安庆府创筑新城，由沿江制置司主持督办；又如蒙军哨马入境，亦是沿江制置司遣将提兵剿逐；再如增填三郡诸军阙额，由沿江制置司负责招募。^⑪沿江制置司节制淮西三郡后，方符合景定《建康志》所言“南北两岸皆隶焉”。淮西三郡因属沿江制置司管辖而被绘入《沿江大阊所部图》中，真州则因与沿江制置司管辖的江面相邻，且州境不大，得以几乎完全绘入图中。此外，沿江制置使赵以夫于淳祐六年七月曾免兼安庆屯田使^⑫，其时吴渊任沿江制置副使，兼蕲、黄、安庆屯田使，可见安庆

① 参见《宋史》卷42《理宗纪二》，第815页。

② 参见《宋史》卷412《孟珙传》，第12375页。

③ 参见《宋史》卷412《杜杲传》，第12382页。

④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33《宋理宗三》，第2736页。

⑤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55《安抚殿撰赵公（希潞）墓志铭》，第6092页。

⑥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78页。

⑦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33《宋理宗三》，第2748页。

⑧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79页。

⑨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留都录三·御札奖谕马光祖筑宜城》，“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57页。

⑩ 《宋史》卷416《王万传》，第12483—12484页。

⑪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94、704—705、707页。

⑫ 参见赵时奚：《宋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东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四百户赠开府仪同三司虚斋赵公（以夫）圻志》，参见张善贵：《长乐金石志》，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2005年，第90页。

府一度曾划归沿江制置副司管辖；淳祐九年二月吴渊除沿江制置使，兼和、无为、安庆三郡屯田使^①，此时安庆府复隶沿江制置司。

景定元年八月，因“江阃节制淮西三郡，巢县尤为要害”^②，宋廷将无为军巢县升镇巢军使，置军额镇巢军。^③后镇巢军使升军，咸淳二年（1266）十一月，沿江制置使带衙改“节制和州、安庆府、无为、镇巢军四郡屯田使”^④。可见宋将亡之时，沿江制置司辖有淮西四郡和州、无为军、安庆府、镇巢军，以及江东三郡建康府、池州、太平州。

结 语

景定《建康志》收录的《沿江大阃所部图》反映了南宋后期沿江制置司辖区范围。本文剖析《沿江大阃所部图》基本内容及其包含的军事信息，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此图的史学和文献价值。对于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笔者通过材料辨析，纠正了沿江制置司在南宋初年设立的观点，认为其设置时间当以开禧二年叶适任沿江制置使为准。沿江制置司的辖区范围随着战争形势，在不同时期多有变化，淳祐二年确立分管和州、无为军、安庆府等淮西三郡，并体现于《沿江大阃所部图》中。就以上诸方面，不仅能够对沿江制置司这一南宋后期的重要军事机构有新的认识，还有助于进一步讨论南宋江淮战区领导体制和防御体系的构成。如沿江制置司管辖淮西三郡，沿江制置副使往往带衙涉及蕲、黄州的兼职，表明对两地有管辖权。而当时又有两淮制置司，当管辖淮西、淮东两路全部地区，但沿江两制司已分管大部分淮西州郡，说明两淮制置司实际仅管辖部分淮西州郡。怎样形成三制置司分管淮西的领导体制？这一问题还未见学界有相关讨论。

《沿江大阃所部图》除具有军事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其他方面亦颇有价值。此图绘出大量有关长江的自然地理要素，如沙洲、河口、河湾，而长江水道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自然系统，将不同时期的长江地图进行对比和分析，进而能够探究长江的沙洲变迁与滩地开垦等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宿万涛

① 参见《宋史》卷416《吴渊传》，第12467页。

②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694页。

③ 参见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38《武卫志一·江防》，“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3册，第1657—1658页。

④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14《建康表十》，“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第1册，第706页。